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蘇軾飲食賦之困境觀照及其文類書寫策略

doi:10.7013/CCTHCWHSNK.200412.0101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6), 2004

作者/Author：許東海

頁數/Page：101-12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4/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13/CCTHCWHSNK.200412.01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蘇軾飲食賦之困境觀照及其文類書寫策略

許 東 海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 壹、緒論：蘇軾飲食賦情志與語言互涉之書寫視界

蘇軾乃中國文學史上一代文豪，兼擅詩、詞、辭賦、古文...等眾體文類，並且具有重要地位。其中辭賦即為蘇軾重視的代表性創作園地之一，從他自許平生功業三部曲之始黃州時期來看，傳誦千古的前、後〈赤壁賦〉即為作者的經典力作。就今存蘇軾的近30篇辭賦而言，他的辭賦創作，終其一生，未嘗間斷。然則辭賦固為蘇軾所重視之一書寫文類。

中國文士的飲食文化史上，蘇軾誠為後世美談的重要典範與焦點之一。其中不乏推崇為美食家、養生家與品酒師者。而他今存的飲食詩文之作，亦頗為豐富，約近百篇。亦可見蘇軾頗有意於飲食文學之書寫。然則就作者而言，這類創作的真正旨趣及其深層底蘊，究竟何所指涉？從過往的相關研究來看，大體多就其中飲食美學與養生之道等主要面向加以探究。至於專門針對蘇軾自請外任或貶遷等不同型態之放逐本質出發，從而依據此後蔚為蘇軾辭賦創作大宗的飲食書寫現象，進一步深究其攸關困境論述與人生況味的重要書寫底蘊，則大體付之闕如。其間偶見涉觸此一命題者，亦如鳳毛麟角，難得一見。且常不免雪泥鴻爪，稍縱即逝，未得駐足觀照，深入剖析。故本文乃嘗試依據蘇軾自我放逐或被迫放逐的心靈困境為原點，並參酌前代相關篇章，探索蘇軾飲食賦中，表層看似繽紛爛然的夢幻鋪陳及其辭賦話語之書寫策略下，攸關困境論述與人生況味的書寫底蘊。

蘇軾飲食賦的弔詭與趣味，實乃根植於游移於放逐與自由、夢幻與真實、諧謔與嚴肅、焦慮與安頓等主要二元對照的情志對話建構，並從而營造其深堪玩味的辭賦語言藝術；其次，蘇軾此一辭賦語言藝術所映現的飲食書寫意蘊，

及其延展滋生的創作意趣，既上契屈〈騷〉、〈遠遊〉放逐與自由之情志質素，亦復互有出入。至於運用夢幻、諧謔、安頓等辭賦語言藝術及其內在意蘊，則儼然重現先秦兩漢辭賦家創作的精神困境。然則兩相對照之下，蘇軾以飲食為題的辭賦書寫又映射出如何之心靈困境？基於上述之思考，本文乃嘗試探索蘇軾飲食賦與楚〈騷〉、漢賦之間，從語言藝術到情志實質所對照映現與牽繫互涉的重要困境意蘊。

蘇軾飲食賦的書寫現象，不僅展現出異於與前代賦家傳統書寫面向之外的變創意涵。更重要的是這類作品亦與蘇軾自我到被動之放逐相終始。其中具有攸關精神困境之豐富深層意蘊，而他這一系列的飲食辭賦，亦別具文策策略上的書寫考慮。同時亦巧妙地映射其中源自楚〈騷〉、漢賦所召喚的辭賦藝術圖騰。

## 貳、蘇軾對前賢飲食賦之書寫因革及其困境觀照

蘇軾辭賦天地裡住居創作大宗的飲食賦，不僅為蘇軾在中國飲食史之美名留下具體註腳；另一方面從清代陳元龍奉敕編撰《御定歷代賦彙》卷100所收錄的歷代飲食賦篇來看，其中蘇軾的八篇也高居首位，誠為飲食賦史上最值得重視的代表作家。

無論從個人辭賦之整體創作成果或飲食賦的書寫歷史而言，蘇軾皆具有重要的代表意義與研究價值。然則蘇軾飲食賦的主要特色之一，乃在創作題材雖不刻意變古，卻又時鑄新意。例如就其題材取向而言，其中實仍不乏濃厚復古取向。例如蘇軾飲食賦高居半數比例的飲酒之作：〈濁醪有妙理賦〉、〈中山松醪賦〉、〈酒子賦〉、〈洞庭春色賦〉。以酒為題材早見於漢魏賦家的鄒陽、揚雄、曹植、王粲等人的〈酒賦〉；但〈洞庭春色賦〉以佳景喻美酒，不無新意；又〈濁醪有妙理賦〉命題強調理趣，俱有異於前人之處。其次，蘇軾〈後杞菊賦〉則明顯承續晚唐陸龜蒙〈杞菊賦〉所作；<sup>1</sup>此外，蘇軾〈菜羹賦〉亦與晉人張翰〈豆羹賦〉構思近似；至於蘇軾其餘兩篇飲食賦，其中如〈服胡麻賦〉以日常食材胡麻代言養生之理；不乏飲食書寫之新意，與前人服食丹石藥餌者迥

<sup>1</sup> 蘇軾〈後杞菊賦序〉謂：「天隨生（陸龜蒙）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陸氏〈杞菊賦〉文）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參見曾棗莊、曾濤編《蘇文彙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卷上，頁1。

異其趣。而《御定歷代賦彙》卷100所收的飲食賦亦未見有以食材養生之前例，<sup>2</sup>其後元人戴表元〈胡麻賦〉即追蹤蘇賦之作。至於蘇賦〈老饕賦〉從其命題而言，更迴出前代飲食賦傳統思維之外，不專從飲食之物本身取意，轉而就飲食之人命題，並出之以「老饕」形象，詼諧中具有濃厚的形象塑造特色，從而凸顯作者的飲食品味及心理，故在蘇軾飲食賦中展現別具一格的變創風格。

蘇軾辭賦與漢唐以來前代賦家的飲食書寫，題材或命題上大體以復古為主，間出新變。或許並不容易明顯映現蘇軾賦追求新變的另一面，然則若進而探索蘇軾與前代賦家近似題材的飲食賦篇，並考察他的這類賦篇的命題取向，仍然可見作者意圖變創的書寫策略。從而也展現他在辭賦散文化之外的新變與開拓。馬積高《賦史》即指出蘇賦「在當時文學技巧和士大夫所能涉及的題材範圍內，他的賦可謂極盡其變。」<sup>3</sup>蘇軾飲食賦書寫取向的主要變創，除可見於上述題材之分析外，還可另就命意取向上加以印證。

據《御定歷代賦彙》所錄早於蘇軾以酒為題的飲食賦，分別為漢魏賦家鄒陽、揚雄、曹植、王粲四人同題之〈酒賦〉，晉人張載〈鄴酒賦〉一篇，共計五篇；至於以醉酒之事命題二篇，則分別為唐代皇甫湜〈醉賦〉與陸龜蒙〈中酒賦〉。其中揚雄〈酒賦〉並非為諷諭漢成帝所作，乃深寓君子立身處世之困的反諷作品，<sup>4</sup>基本上可見融合詠物與寓言的書寫策略；鄒陽〈酒賦〉則出自「宣上德而盡忠孝」的雍容揄揚之作。<sup>5</sup>至於曹植創作〈酒賦〉的動機，則是針對揚雄〈酒賦〉的「戲而不雅」而發，據曹植〈酒賦序〉云：「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於是曹植乃原始表末，亟稱飲酒貴在節度，並歸旨於先王、君子之德音。<sup>6</sup>王粲〈酒賦〉與曹植之作，旨趣近似，主要分從飲酒之「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與「賊功業而

2 《御定歷代賦彙》所收晉人嵇含〈寒食散賦〉，從辭賦命題看似近魏晉以藥餌養生之作，然究其賦文則為作者以藥散治治病之衍述，據〈寒食散賦序〉謂：「余晚年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京都：中文出版社，1974），卷100，頁1402。

3 參見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430。

4 參見葉幼明《新譯揚子雲集》（臺北：三民書局，1997），頁122。

5 參見漢·班固〈兩都賦序〉，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311。

6 曹植〈酒賦〉謂：「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遨翔。將承芬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縱橫譁譁。…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饗者忘貧。…此乃淫荒之原，非作者之事。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124。

敗事，毀名行以取誣。…孰不飲而罹茲，罔非酒而惟是。」的正反兩面，<sup>7</sup>論述其間禍福得失。至於晉人張載〈鄙酒賦〉基本亦在歌頌酒德之盛美，所謂「惟聖人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播殊美於聖載，信人神之所悅。」篇末大體歸旨於酒德之攸關古今成敗，頗寓自惕之旨。<sup>8</sup>此外，與張載同時晉代名士劉伶〈酒德頌〉，雖未見錄於《御定歷代賦彙》，此文不以賦為題，然究其實即為賦體，文中藉大人先生飲酒之曠放，撻伐當代世俗禮法之偽，自成一格。<sup>9</sup>由上可見漢魏六朝以酒為題之飲食賦大體以鋪陳酒之歷史沿革及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功德，並強調酒對於君王治國與君子之身榮辱成敗之重大影響，其間映現以諷諭與箴規為主的旨趣取向。

唐代以酒為題的飲食賦，據《御定歷代賦彙》所錄有皇甫湜〈醉賦〉與陸龜蒙〈中酒賦〉兩篇。此外，敦煌遺書內亦有題名劉長卿〈酒賦〉一篇。其中皇甫湜〈醉賦〉為作者藉已過往縱酒行跡自嘲並規勸友人，故其〈醉賦序〉云：「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搢紳處士。余嘗為沈湎所困，因作醉賦，寄嘲任山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耳。」<sup>10</sup>此賦在書寫動機上實一反劉伶〈酒德頌〉縱酒形跡，勸人勿逞一時之興誤墮其途，致違大人之道；至於陸龜蒙〈中酒賦〉則主要抒發懷才不遇，憤世嫉俗之情。賦中不免流露藉酒以澆胸中塊壘之意：「書編百氏，病載千名。將有濱於九死，諒無敵於餘醒。…才遭躡轢，適別恩情。屈大夫之獨醒，應難共語。阮校尉之連醉，不可同行。」從而歸諸從隱忘憂之旨。<sup>11</sup>此外，敦煌遺書收錄〈酒賦〉一篇，內容極力鋪陳飲者別有天地之樂，並指涉衣冠名利之不復可求，如篇末所謂：「人生一代不榮華，彭祖徒勞年七百。醉眠更省何所憂，衣冠身外復何求。但得清樽消日月，莫愁紅粉老春

7 王粲〈酒賦〉，《全漢賦》（同註5），頁670。

8 張載〈鄙酒賦〉：「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行。…察成敗於古今，垂將來於茲篇。」，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全晉文卷85，頁882。

9 參見劉伶〈酒德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同前註），全晉文卷66，頁682。

10 唐·皇甫湜〈醉賦〉，《御定歷代賦彙》（同註2），卷100，頁1394。據其賦末歸旨謂：「乃今家荒惑之具，沉耳目之機。其解須臾，憂患繁滋。…負責之道，陰陽戾違。…辱身滅名，瘞肺淫支。狼狽猖獗，為大人嗤。」

11 陸龜蒙〈中酒賦〉，《御定歷代賦彙》（同註2），卷100，頁1394。其賦末歸旨謂：「豈此夫榴花竹葉之味，鄙水中山之碧。必能醺骨蛇顏，潛銷暗釋。沉前覆乃後世之警，獨行為眾人之僻。不然吾受教於前賢，敢忘乎歡伯。」



秋。」<sup>12</sup>此賦寫飲者享興壯情，不乏李白〈將進酒〉之影跡，可以略窺唐代詩賦融合之一端。

由上述漢唐以來以酒為賦等篇章之考察，大體可以歸結其書寫旨趣的主要取向：（一）酒與禮樂教化。漢晉時期鄒陽、曹植、王粲三人之〈酒賦〉與張載〈鄴酒賦〉等即為其例。（二）酒與立身處世。這類旨趣大體可以漢揚雄〈酒賦〉、晉劉伶〈酒德頌〉、唐皇甫湜〈醉賦〉、敦煌〈酒賦〉為例。（三）酒與士不遇。例如晚唐陸龜蒙〈中酒賦〉力陳其間「深窮寂寞之境，別有淒涼之域。」然則漢晉六朝隋唐的飲酒賦家，大體並未發現像蘇軾深好此道，並撰寫一系列的飲酒辭賦。據蘇軾傳世的此類賦，共計四篇，即〈濁醪有妙理賦〉、〈中山松醪賦〉、〈酒子賦〉、〈洞庭春色賦〉。其中原因應與蘇軾嗜好飲酒之樂有關。因此他雖然酒量極淺，然卻樂於此道，故〈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自序〉謂：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sup>13</sup>

酒之於蘇軾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亦可從其自撰〈東坡酒經〉闡釋釀酒心得印證。<sup>14</sup>然則東坡與酒之相契無間，亦可以他在〈飲酒說〉兩篇所述：

予雖飲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盞為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嗜飲酒人，一日無酒則病。一旦斷酒，酒病皆作。…吾平生常服熱藥，飲酒雖不多，然未嘗一日不把盞。…今年飲酒至少，日日病，雖不為大害，然不似飲酒服熱藥時無病也。<sup>15</sup>

由上可見酒與東坡之緣深可謂終其一生。<sup>16</sup>

12 此賦一名〈高興歌〉、〈高興歌酒賦〉，篇題不一，應與流傳的時代有關。參見張錫厚《敦煌賦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頁203。其中題解引王小盾說加以詮釋。

13 參見宋·蘇軾〈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35，頁1881。

14 參見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6），後集卷9，頁527。

15 參見蘇軾〈飲酒說〉，《蘇東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卷93，頁5276、5278。

16 參見黃啓方〈我雖不解飲，把盞歡意足——東坡酒量淺論〉，《東坡心靈世界》（臺北：學生書局，2002），頁5-12。

《御定歷代賦彙》中所見蘇軾四篇飲酒賦，間亦不乏稱頌酒德之內容，這一部分大體亦承傳於前代酒賦的既有書寫脈絡，映現禮樂教化觀照下的酒功酒德。尤其他以律賦八韻撰成的〈濁醪有妙理賦〉即以「神聖功用無捷於酒」立韻，賦文中極力闡發酒之功德，可與其〈既醉備五福論〉相輝映。例如：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

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

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并。

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sup>17</sup>

蘇軾之前如揚雄等人所撰的酒賦，強調飲酒之道與立身處世二者互涉。蘇軾的這四篇酒賦，亦不乏相關鋪陳，而且經常結合展現才學的典故運用。例如〈濁醪有妙理賦〉在「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之外，又羅列魚貫地指陳古今好飲之士立身行世的優劣得失：

惟此君獨遊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問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妾。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靴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逃地，常陋王式之褊；烏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sup>18</sup>

又如〈中山松醪賦〉篇末同邀飲酒前賢，追風遠遊，指涉飲酒之士可躋「幽姿之獨高」境界：

17 以上引文俱見蘇軾〈濁醪有妙理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8，頁511。

18 參見宋·蘇軾〈濁醪有妙理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8，頁511。

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群豪。與八仙之群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歎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sup>19</sup>

類似的鋪陳指涉，亦可見於另一篇〈洞庭春色賦〉，此賦開首除點出「宣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的立身意蘊外，篇末亦借酒抒發對歷史人物平生形跡的感慨：

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惇鯨。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sup>20</sup>

此外，蘇軾另撰〈酒隱賦〉一篇，收錄於《御定歷代賦彙》曠達類。據〈酒隱賦序〉：「鳳山之陽，有逸人焉，以酒自晦。…隱者患其名之著也。於是投迹仕途，即以混世。…嘗與游，因與作賦，歸書其堂云。」<sup>21</sup>可見此賦取義於以酒為隱，其中立身處世旨趣頗為明顯，賦篇內容因借酒隱君嘲諷歷史上「池邊倒載，甕下高眠。背後持錘，杖頭掛錢。遇故人而腐脇，逢曲車而流涎。」好酒諸士，乃「暫托物以排意，豈胸中而洞然。」皆未臻酒中名賢之域。然則〈酒隱賦〉離析酒中諸君立身行世之真偽高下，其旨炯然。

由上述蘇軾以酒為題的飲食賦之相關考述，大體可見前代飲酒賦的主要旨趣仍然牽動著他的創作取向。然則蘇軾亦並未陷入既有的傳統書寫框架。因此即使如賦藉由飲酒論述歷代飲酒前賢的立身處世之道，仍必出之大量典故以示學逞才，並結合變創的敘寫策略，避免因堆垛故實造成板滯苦澀的窘境。此外，蘇軾飲食賦除善於變創的書寫策略外，對於前賢飲酒辭賦的取精用宏，亦是蘇軾散發獨特魅力的重要基礎，而且主要展現在以酒為題的傳統辭賦書寫範疇。然則就蘇軾飲食賦整體所映現之困境觀照特色而言，究竟與前代辭賦有何交集與異趣？

前文所述蘇軾幾篇酒賦雖不免浮現前代賦家的書寫身影，然則整體而言，蘇軾飲食賦重要的書寫基調乃在出之以困境觀照及其隱喻。至於前述揚雄〈酒賦〉雖亦涉及困境意涵，但書寫重心並非聚焦於飲酒本身，與蘇軾殊異。然則這一創作底蘊，大體亦貫穿蘇軾以飲酒為題之外的其他飲食賦。從《御定歷代

19 參見宋·蘇軾〈中山松醪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8，頁510。

20 參見宋·蘇軾〈洞庭春色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8，頁509。

21 參見宋·蘇軾〈酒隱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5），卷1，頁50。



賦彙》所收錄漢魏至晚唐的前人飲食賦來看，蘇軾並非無所依傍。尤其時代距他較近的晚唐陸龜蒙賦，對於蘇軾飲食賦所展現這一書寫特色應不無牽動作用，值得細加探索。

《御定歷代賦彙》所收晚唐以前的飲食賦作者，基本上皆為孤篇，其中唯一的例外，即為陸龜蒙兼撰〈中酒賦〉與〈杞菊賦〉兩篇。可見陸氏在晚唐以前飲食賦作家群裡具有重要代表意義，而在時間上又最為接近蘇軾。這對於飲食賦創作興味勃然並且後出轉精的蘇軾而言，應不致輕易加以忽略。這一點從蘇軾依仿陸龜蒙〈杞菊賦〉撰成〈後杞菊賦〉的具體事實即清楚可證。

蘇軾〈後杞菊賦〉的撰寫緣起不僅源自陸龜蒙〈杞菊賦〉，甚且細讀兩賦之內容，亦能洞燭其中的書寫交集。陸氏〈杞菊賦〉藉由安貧樂道與刻苦自勵的隱士形象，映照作者不與世俗浮沈的傲骨幽姿，甚至其中不乏流露肉食者鄙的相關指涉。孤芳自賞之態躍然紙上。據陸氏〈杞菊賦序〉自述：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采擷之，以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旦暮猶責兒童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牽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退之作〈杞菊賦〉以自廣云。<sup>22</sup>

陸龜蒙以杞菊為生並自恃高風的苦行僧式精神，固然取義於「惟杞惟菊，偕寒互綠。」然則賦末所謂「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sup>23</sup>，對於「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之困境自處，顯然頗引以自豪。

陸龜蒙〈杞菊賦〉所映現的困境觀照，從其平生經歷而言，大體初入仕途不遇之外，亦憤世嫉俗，復又時以古聖賢自惕，據本傳所載：

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兩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或饑其勞，答曰：「堯舜黜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紫、甫里先生，自此翁、漁夫、

22 參見唐·陸龜蒙〈杞菊賦〉，《御定歷代賦彙》（同註2），卷100，頁1397。

23（同前註），卷100，頁1397。

江上丈人。後以高士招，不至。<sup>24</sup>相對而言，蘇軾撰寫〈後杞菊賦〉不乏對陸氏以杞菊自視、自持、自恃的始疑終信。據〈後杞菊賦序〉謂：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sup>25</sup>

據蘇軾最初的體認，陸龜蒙〈杞菊賦〉乃出自「士不遇」之窮約困境，然則「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未免矯情太過，難以理解。然則待其「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之真切體驗後，才恍然大悟陸氏〈杞菊賦〉之困境實體，態度一轉而為「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並從而促成其〈後杞菊賦〉之撰寫。由蘇軾這一賦序亦可見陸氏與蘇軾兩篇前後〈杞菊賦〉的文學因緣，主要關鍵即繫於二人對困境實體的共同觀照及其自我見證。故蘇軾賦序所謂「以自嘲，且解之云。」實涵蓋兩個層面，即一為對陸氏賦中杞菊書寫始疑終信態度的自嘲；其次，則是抒發身處困境的自我觀照及其消解之道。

陸龜蒙與蘇軾在唐宋飲食賦的創作園地的因緣匪淺，其中除上述兩者前後〈杞菊賦〉所創造的對話架構外，陸龜蒙的另一篇〈中酒賦〉亦不應忽略。此賦對於蘇軾飲酒諸賦的牽動，雖不似前、後〈杞菊賦〉，可輕易從賦篇命題上立見端倪。然而兩者之間，亦未必毫無脈絡可尋。

據《新唐書·陸龜蒙傳》：「（陸氏）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繫壺置杯不復飲。」<sup>26</sup>陸氏嗜酒多年，並與皮日休詩酒唱和，據皮氏〈續酒具詩序〉謂：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誠酒禍也深矣。…余飲至酣，…天之不全余也多矣，獨

24 參見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96隱逸，頁5612。

25 參見宋·蘇軾〈後杞菊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19，頁231。

26（同註24），卷196，頁5612。

以麴藥全之。於是徵其具，悉為之詠。以繼東臯子酒譜之後。…以示吳中陸魯望（龜蒙），魯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為池而飲之者，有象為龍而吐之者。…故添六詠。予覽之，慨然歎曰：予亦嗜酒好詩者也。<sup>27</sup>

序文除記述陸、皮二人的詩酒唱和情狀外，更指陳對古來前賢藉酒鄉逃世的困境觀照：

昔退之有言送王含曰：少時讀醉卿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其世，而猶省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中古之時，為之麴藥，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名酒后。近世以來，人徒酣醺。…於是更作酒后、酒仙、酒徒、酒保…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始終相成之義耶。<sup>28</sup>

文中所謂「知彼雖偃蹇」、「於是有託而逃者也」指陳陸、皮二人對古今飲酒之士的困境觀照。皮日休另有〈酒箴〉以求為醉民不得反諷當世，並指涉自我困境。<sup>29</sup>至於陸龜蒙則在士不遇主題的書寫基礎上，藉病酒之「寂寞之境」、「淒涼之域」等相關情境鋪染，映現作者「才遭躡轢，適別恩情」的仕途困境。即與其〈自憐賦序〉所謂：「其為窮且否，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是不蒙五福，偏被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sup>30</sup>幽疾貧苦的困境書寫相輔相成。從而適為陸龜蒙〈中酒賦〉異於前代飲酒諸賦的主要變創特色。

陸氏〈中酒賦〉以醉鄉書寫指涉精神困境，從而藉酒「潛銷暗釋」其胸中鬱結的書寫策略，確實展現其超越前賢的特色。其中經由具體酒鄉情境的淒美鋪陳，儼然營構出善於造設的夢幻風情。從而凸顯遊移於困境與夢幻之間書寫特色。這一點形成陸龜蒙與蘇軾兩者飲酒賦主要的書寫交集。

蘇軾飲酒賦最能具現困境書寫者，乃撰寫於元祐、紹聖貶知英州之〈中山松醪賦〉，此賦儼然流露魏晉名士飲酒讀《騷》的困境意蘊：

27 唐·皮日休〈續酒具詩序〉，《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786，頁8353。

28（同前註），卷786，頁8353。

29 參見唐·皮日休〈酒箴〉，（同註27），卷797，頁8362。

30 參見唐·陸龜蒙〈自憐賦〉，（同註27），卷800，頁8393。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皋。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歎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sup>31</sup>

蘇軾自述撰寫此賦時「若訴予之不遭」的情志底蘊，其中所映現屈〈騷〉之傳統士不遇書寫旨趣，與陸龜蒙〈中酒賦〉「才遭躡轢，適別恩情。屈大夫之獨醒，應難共語。阮校尉之連醉，不可用行。」幾乎若出一轍。此種書寫取向亦為陸氏之前飲酒賦所絕無僅有，可見蘇軾與陸氏飲酒賦書寫脈絡之間確有特殊相契之處。

酒之為物對於蘇軾而言，經常牽動自我的人生困境觀照，此亦印證於他的詩文裡，例如撰於謫遷汝南儋州的〈桂酒頌〉即說：

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宜非天哉。」<sup>32</sup>

蘇軾另一篇酒賦〈洞庭春色〉雖為正面大肆鋪衍，然則篇末巧妙藉「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惇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等吳越歷史的緬懷追悼，一澆自我的胸中塊壘。此事驗諸他同時另撰的〈洞庭春色〉詩謂：「應呼釣詩，亦號掃愁帚。…須君灑海杯，澆我談天口。」<sup>33</sup>借酒澆愁之困境指涉昭然若揭。

從上述考察蘇軾飲食賦之困境書寫，與陸龜蒙〈杞菊賦〉、〈中酒賦〉等篇不乏具體的書寫交集。此外，飲酒篇章之涉及夢幻色彩者，可以劉伶〈酒德頌〉、王績〈醉鄉記〉為代表。〈酒德頌〉基本上寫「大人先生」之「惟酒是務，焉知其餘」的逍遙世界，<sup>34</sup>極具夢幻色彩，與阮籍〈大人先生傳〉相互輝映；至於初唐王績〈醉鄉記〉單刀直入大肆鋪衍醉鄉勝境，其旨趣大體見諸篇

31 參見宋·蘇軾〈中山松醪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8，頁510。

32 參見宋·蘇軾〈桂酒頌〉，《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9，頁515。

33 參見宋·蘇軾〈洞庭春色詩〉，《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34，頁1835。

34 劉伶〈酒德頌〉謂其世界乃「以天地為一朝，萬物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視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同註8），卷66，頁682。

首與末文兩處：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而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為之記。<sup>35</sup>

劉伶、王績飲酒篇章的夢幻色彩，對於蘇軾飲酒賦中經常出現的夢幻取向，應有所啟發，其中如號稱東臯子的王績，蘇軾更坦言尚友其人，引為千古知己。並於所撰〈書東臯子傳後〉縱論平生飲酒，深推其賢，甚至產生不讓前賢專美之想。<sup>36</sup>因此王績飲酒及其相關作品對於東坡不無啟發，應無疑問。然則就辭賦這一文類而言，由於王績〈酒賦〉已佚，無從考察與蘇軾飲酒諸賦的可能關係。因此，就目前傳世的飲酒賦而言，晉代劉伶〈酒德頌〉以頌代賦，固然出現「沈湎於酒」、「心遊於夢」<sup>37</sup>二者合流之書寫特質，但並未觸及夢境書寫本身，故只能視為明而未融之關係。至於王績〈醉鄉記〉本非賦體，文中所勾勒的醉士王國旨在藉由他界意圖對照現實世界的喪亂失道，於是醉鄉書寫畢竟在王績「何其淳寂如是也」的觀照之下，儼然成為嚴肅的人生反諷與政治指涉。至於〈醉鄉記〉夢幻藍圖所映現的世外桃源取向，終淪為王績遙不可及的理想國，乃至於生命困境的神話召喚。誠如此文開宗明義地揭示：「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卻在篇末歸旨於「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積將遊焉。」換言之，王績〈醉鄉記〉固然不出困境書寫本質，然則醉鄉的夢幻色彩，適成為困境隱喻本身的對照載體，絕非困境觀照下

35 參見唐·王績〈醉鄉記〉，《王無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5，頁181。（同註27），卷800，頁8393。

36 〈書東臯子傳後〉謂：「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置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遊，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志。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同註14），卷9，頁524。

37 參見唐·皇甫湜〈醉賦序〉謂：「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搢紳處士。余嘗為沈湎所困，因作醉賦。」其賦首章謂：「沈湎於酒，有晉之七賢。必遊於夢，境墮於煙。」，《御定歷代賦彙》（同註2），卷100，頁1394。



的情志轉換及其消解安頓。這終究與蘇軾飲酒賦困境與夢幻當下融合的書寫本質及其組構呈現絕大的異趨性。至於與東坡時代最近的陸龜蒙，其〈中酒賦〉雖亦未具體展開夢境書寫，然則誠如賦中所述：「窗間落月，枕上殘更。意欲問而無問，夢將成而不成。」<sup>38</sup>然則陸龜蒙於中酒之半夢半醒之間的書寫情境，畢竟較諸上述劉伶、王績二人之飲酒書寫，更趨近夢境邊界；其次，〈中酒賦〉遊移於酒境與夢鄉、仕途及其人生困境以映現自我的書寫取向，亦更契合蘇軾酒賦諸篇飲酒、夢幻與困境三者合一的書寫特色。例如蘇軾〈洞庭春色賦〉首引飲酒而終歸醉夢書寫，即為其中典型：

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化三江於一吸，吞雲龍之神奸。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惇鯨。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sup>39</sup>

又如〈中山松醪賦〉則在半夢半醒之間，展開酒鄉神遊的困境隱喻：

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群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歎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sup>40</sup>

蘇軾其他飲食賦亦不乏融合飲食、夢幻、困境於一爐的書寫程式，例如撰於海南儋州之〈老饕賦〉既以「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為始，而賦篇中段約居半數的篇幅，全為夢幻書寫。<sup>41</sup>由上亦可見飲食、夢幻、困境合一的特色，乃蘇軾飲食賦普遍體現的書寫特色，至於其中所隱喻的自我仕途乃至生命困境，確實是前有所承，其中晚唐陸龜蒙兩篇飲食賦的影響應是最為具體而深刻。至於劉伶、王績飲酒篇章特色，在蘇軾飲酒賦諸篇亦有跡可尋，不宜加以

38 參見唐·陸龜蒙〈中酒賦〉，《御定歷代賦彙》（同註2），卷100，頁1394。

39 參見宋·蘇軾〈洞庭春色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8，頁509。

40 參見宋·蘇軾〈中山松醪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8，頁510。

41 參見宋·蘇軾〈老饕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續集卷3，頁94。

忽略。然則以飲食、夢幻、困境為飲食賦書寫重要特色的蘇軾，於上述前有所承的書寫脈絡之外，畢竟自有超軼前人之變創。其中迥異前人困境書寫的主要關鍵為何？其次，蘇軾大量運用辭賦體書寫飲食的創作意蘊為何？而這兩者之間，抑復具有何種重要關鍵？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索。

### 參、蘇軾飲食賦之困境變創與辭賦語言藝術

困境書寫是蘇軾飲食賦的創作基調，然則不同作者困境取向常有歧異。從晚唐以前的歷代飲食賦來看，或者借酒寄寓處世之難，如揚雄〈酒賦〉，其後曹植以「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sup>42</sup>則大體與困境無涉。晉代名士劉伶〈酒德頌〉以縱酒放浪，指涉當世的名教浮虛。唐代皇甫湜〈醉賦〉則針對劉伶〈酒德頌〉作逆向思考，意圖在酒醒時分遠離困境，自惕與喻友之義兼具：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搢紳處士。余嘗為沈湎所困，因作醉賦，寄嘲任山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耳。<sup>43</sup>

至於晚唐陸龜蒙〈中酒賦〉則借酒澆愁自寬，書寫仕途不遇之人生困境。而他另一飲食之作〈杞菊賦〉亦借飲食本身之困境，指涉作者雖潦倒不遇，卻傲然自恃的士人風骨。憤世嫉俗之意隱約可見。故困境取向畢竟因人而異，而且代有嬗變。

上述飲酒賦篇所映現的困境取向，其中陸氏藉飲食困境隱喻仕途及其人生困境的書寫特質，與蘇軾飲食賦最為契合。此中具體原委，蘇軾在賡續陸氏之作的〈後杞菊賦序〉即有所陳述。<sup>44</sup>然則前後〈杞菊賦〉二賦固然皆以飲食困境指涉仕宦困境，然則蘇軾之異於陸龜蒙者，乃在後者源自仕途不遇，深寓不如歸去以閑居慎獨之憤。其〈中酒賦〉之意緒頗似宋玉〈九辯〉之悲，而〈後杞菊賦〉則離群索居以憤世嫉俗；至於東坡初入仕途，年少得志，迥異陸氏命運。然則終究不免陷入近似陸氏飲食及其生活困境者，乃源自朝政新法之剛愎無當，因此藉由密州仕宦之飲食困境，反諷時政，從而映現蘇軾憂國憫世的胸

42 參見魏·曹植〈酒賦序〉，〈同註6〉，頁124。

43 參見唐·皇甫湜〈醉賦〉，《御定歷代賦彙》（同註2），卷100，頁1394。

44 參見宋·蘇軾〈後杞菊賦〉，《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19，頁231。

襟，因此以小喻大，非陸賦仕途不遇退而隱世之旨，其中所書飲食之困，所寓則治國之弊。而此賦亦與他同年所撰〈次韻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其二〉相互印證。<sup>45</sup>

何人勸我此間來，弦管生衣甑有埃。淙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窮寇，洒涕循城拾棄孩。為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sup>46</sup>

詩中除反映民不聊生外，亦提及東坡飲酒之匱乏，並反諷當朝權貴之耽於宴樂，無視蒼生之苦。然則此為蘇軾飲酒、飲食賦困境書寫迥異前人關鍵之一，因此蘇軾賦之飲食困境書寫，不僅跳脫前代這類賦篇之傳統框架，甚且超越陸龜蒙〈杞菊賦〉裡囿於士不遇的自苦與自傲格局，並進一步擴大詠物賦「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sup>47</sup>的傳統書寫程式，從而展現近似漢代京殿苑獵大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飲食書寫變創。其中既有蘇軾自嘲自解的情志軌跡，亦復重現賦乃古詩之流的諷諭精神。然則對照蘇軾三年後烏臺詩案中「謗訕朝政」、譏切時事的主要罪由，<sup>48</sup>〈後杞菊賦〉此一重要困境意蘊應是事出有因。

蘇軾賦對於君子立身及其仕宦進退之道，好以飲食為喻，亦可驗諸其他文類作品，例如撰於元豐二年詩案稍前的〈靈壁張氏園亭記〉謂：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sup>49</sup>

然則當時朝中新政權貴，視蘇軾詩賦之作為謗訕朝政之罪，固可商榷，然則蘇軾藉飲食諸賦寄寓困境諷諭微旨，大體應為信而有徵。<sup>50</sup>其藉由賦體結合飲食困境之書寫，在看似微不足道的詠物鋪陳之下，進行古詩流亞側隱微諷之義，從而展現飲食書寫「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困境觀照及其變創策略。〈後杞

45 參見曹慕樊〈東坡後杞菊賦解〉，《東坡文論叢》（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頁92-95。

46 參見宋·蘇軾〈次韻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蘇東坡全集》（同註14），卷7，頁82。

47 參見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譯注《文心雕龍·詮賦》（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163。

48 參見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18，頁446-451。

49 參見宋·蘇軾〈靈壁張氏園亭記〉（同註14），卷32，頁358。

50 據宋·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引〈御史臺檢會送到冊子〉謂：「據審刑院尚書刑部狀，御史臺根勘到祠部貢外郎、直史館蘇軾，作為詩賦并諸般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北京：中華書局，1995）

菊賦〉即為典型的具體註腳。

其次，蘇軾藉由飲食困境本身的相關鋪陳，展現其迥異前代飲食賦藉飲食或醉酒書寫指涉困境的書寫程式。這一深具變創意義的書寫策略，基本上仍源自蘇軾充分運用賦體在「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之外，正言若反與寓諷於頌的傳統譏諷策略。<sup>51</sup>其中具體關鍵主要乃在夢幻或擬夢型態之書寫策略奏效。於是身陷實際飲食困境的蘇軾，宛如文學舞台上大肆釋放七彩煙霧的魔法大師，誘引讀者恍如置身神仙美食樂園般，陶然忘機，渾然不識人間煙火的真實困境況味。例如蘇軾同時撰於貶居海南儋州的〈老饕賦〉與〈菜羹賦〉兩篇，前者就飲食者的貪戀形象立題，後篇則自飲食之物著墨。然則就其實際撰寫背景來看，〈老饕賦〉撰於元符二年，儋州大旱，作者有絕糧之憂；<sup>52</sup>至於〈菜羹賦〉蘇軾於〈序〉曾自述：「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蘆菹、苦薺而食之。」可見二賦皆出於蘇軾晚年貧困所作，然則作者筆下卻極盡夢幻設色之能事。例如〈老饕賦〉之仙境虛擬與〈菜羹賦〉之美食風情：

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景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綽。閤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柸之瓊艘。各眼灑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sup>53</sup>

登盤盂而薦之，具匕箸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吾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傳說而策勲。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sup>54</sup>

賦篇正文所鋪陳的美食夢幻，不僅遠遊仙界，抑且上傲古人，與真實生活的蘇軾顯呈天壤之別。從作者的文類書寫策略而言，早已是漢賦前賢，如司馬相如〈大人賦〉等所慣用，這對於同為出身蜀地一代文豪的蘇軾而言，固宜如數家

51 參見簡宗梧先生〈從專家賦家的興衰看漢賦特性與演化〉，《漢賦史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221-223。

52 參見孫民《東坡賦譯注》（成都：巴蜀書社，1995），頁48。

53 參見宋·蘇軾〈老饕賦〉，（同註14），頁94。

54 參見宋·蘇軾〈菜羹賦〉，（同註14），頁95。

珍。亦如漢賦之於成長於蜀地前賢詩仙李白所形成另一種文化意蘊的鄉愁召喚。<sup>55</sup>因此不論對於司馬相如的推譽，或對於揚雄賦論的有所不滿，<sup>56</sup>其實皆反映出蘇軾對於蜀地前賢賦家的重視與深思。因此運用賦體，商榷古今，以作為謫居異鄉荒島的困境反思及其書寫策略，固然與他一向重視辭賦相關。<sup>57</sup>其次，從蘇軾的學養而言，除擅長詩、賦、詞等類韻文外，古文亦為其重要創作文類代表。其中策略一類文章，早從年少參與科舉考試時即勤下功夫，仕宦之後亦時有創作，展現其輔世濟時的深思熟慮。<sup>58</sup>因此蘇軾不一而足地密集運用飲食賦作為生命困境省思的重要隱喻與文類策略。而兩者之間的終極底蘊則共同導向超越困境之深思與商榷。其中策略之文出於為國立計，飲食賦則主要植根於自我困境及其生命出路之探索。其間映現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策略異趨。因此蘇軾飲食賦經常出現的夢幻取向及其困境書寫之正言若反等，乃至篇章結構上以夢醒時分的曠達省悟等等，都不乏漢賦曲終奏雅的具體身影。<sup>59</sup>

其次，這一藉由夢幻虛擬型態的賦筆鋪排及其曲奏終雅，蘇軾亦經常出之以自嘲自解的諧謔口吻。例如〈老饕賦〉之篇末旨歸謂：

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  
先生一笑而起，渺海濶而天高。<sup>60</sup>

春夢無痕之際，以茶醒酒，儼然以曠達笑傲之姿揮別夢幻虛擬之境，從而映現其心靈困境之超越想望；〈酒子賦〉所謂「先生既醉而醒」，在酒鄉中既品茗「若嬰兒之未孩」、「又若時女之方笄」之不同飲酒況味，又復領略「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瞰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sup>61</sup>的四季朝暮不同風情。然則賦篇之「出妙語而瓊瑰。」不免終將跌返「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的現實困境。其中酒境的夢幻書寫，適為作者困境觀照的自嘲自解。因此像〈洞庭春色賦序〉，蘇軾於篇首既稱「戲作賦」，賦文

55 參見許東海《詩情賦筆話謫仙：李白詩賦交融之多面向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56 參見簡宗梧先生〈蘇軾賦觀及其相關問題〉，《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出版社，2001），頁811-813。

57 參見顧易生〈蘇東坡與賦〉，《顧易生文史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333。

58 參見宋·蘇軾《應詔集·策略》（同註14），卷1，頁736。

59 參見漢·司馬相如〈大人賦〉，《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91。

60 參見宋·蘇軾〈老饕賦〉（同註14），續集卷3，頁94。

61 參見宋·蘇軾〈酒子賦〉（同註14），後集卷8，頁511。



又大肆「醉夢紛紜」之鋪設，然則篇末曲終奏雅則有「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然則所指此賦言夸，不即反映出蘇軾對於賦體浮夸的充分認知，並且有意識地運用此文類特性作爲其困境觀照的書寫策略。至於夢幻虛擬與曲終奏雅的書寫本爲漢賦代表名家如司馬相如、揚雄等人慣見的寫作特色。至於出之戲謔雖可見蘇軾之曠達自適，然則揚雄〈解嘲〉固亦名篇，以蘇軾好與揚雄文學對話來看，〈解嘲〉之於蘇軾賦或亦不無牽動關係。其次，喜好出之以諧謔滑稽的口吻，固然慣見於漢賦名家如東方朔等人篇章，即使如重視諷諭之揚雄亦有〈逐貧賦〉寓莊於諧之作。乃至於蘇軾飲食賦如〈洞庭春色賦〉之自述「言誇」及其耽於使典逞才，皆一一具現漢賦的重要語言藝術特色。<sup>62</sup>可見蘇軾飲食賦確不乏濃厚的漢賦書寫身影。至於蘇軾之好談夢幻，如其詩文中頗不乏〈記夢〉、〈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夜夢〉、〈夢中作寄朱行中〉、〈夢齋銘〉等等說夢篇章，此固然與其佛思禪悟深契。<sup>63</sup>然則從文類書寫的歷史而言，賦體與魂夢的密切融合，對於蘇軾文學世界之研究而言，故宜值得重視。<sup>64</sup>

蘇軾飲食賦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撰寫當時的處境。飲酒諸篇中〈酒隱賦〉的年代較早，爲烏台詩案後謫居黃州時期的元豐年間。<sup>65</sup>〈后杞菊賦〉撰於熙寧八年密州太守任上。此外，除〈服胡麻賦〉撰於熙寧四年；〈老饕賦〉與〈菜羹賦〉皆遲至貶居嶺海時期之作。上述蘇軾飲食諸賦年代，最早的〈服胡麻賦〉性質較爲特殊，乃蘇軾赴陳州與弟蘇轍酬贈之作，兄弟賦篇主藉由道士之夢論述養生之道。由於此時蘇軾尚未明顯遭朝中新貴排擠，大體無涉困境，故暫不論述外。〈后杞菊賦〉是其餘諸篇最早撰寫者。然則此時固未遭元豐二年烏臺詩案，卻已是蘇軾感受朝中新黨誣陷，故自請外放。至於〈老饕賦〉、〈菜羹

62 參見簡宗梧先生〈賦體語言藝術的歷史考察〉，《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193。

63 參見黃啓方〈古今如夢，何曾夢覺——東坡的夢裡乾坤〉（同註16），頁159。另參見朱靖華〈天地精境——評蘇軾嶺海時期的人生反思〉，《蘇軾論》（北京：京華出版社，1997），頁449；謝建忠〈論佛教哲學與蘇軾的人生如夢思想〉，《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卷21第6期，頁54—58。

64 參見許東海〈登高與追夢：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的辭賦身影及其體物寫志〉，《另一種鄉愁》（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04），頁211。

65 各篇創作時間〈酒隱賦〉雖收入《御定歷代賦彙》之「曠達」類，非如〈洞庭春色賦〉、〈酒子賦〉…等賦，歸入「飲食」一類，但究其攸關飲酒，不妨亦歸入飲酒賦一併討論。據孫民考述〈酒隱賦〉約撰於元豐三年（1080）至七年間（1084）；〈洞庭春色賦〉約撰於元祐六年（1092）作者出知潁州；〈中山松醪賦〉撰於紹聖元年（1094）作者貶知英州；〈酒子賦〉撰於紹聖元年（1094）貶惠州時。〈濁醪有妙理賦〉撰於晚年貶海南儋州時期。參見氏撰《東坡賦譯注》（成都：巴蜀書社，1995）。

賦〉與飲酒諸賦，則皆為烏臺詩案貶謫各地所作。因此從這些蘇軾飲食賦的撰寫背景而言，大體皆屬作者身陷仕宦及其人生困境時期。於是藉由飲食困境指涉仕宦及其人生困境省思的書寫旨趣，便成為蘇軾飲食賦困境觀照的主要重心。然則無論自請外放或被動遷謫，就其精神層面而言，皆不免被迫置身於一種放逐的客觀狀態。從而此一放逐本質形成蘇軾飲食賦困境觀照的重要依據。

放逐困境延展而為飲食困境，固無庸論。然則被迫置于放逐困境的蘇軾，飲食之窘迫基本上著重身體觀照，但藉由蘇軾飲食賦困境觀照之檢視，卻不難發現作者企欲以精神幻遊的書寫策略，建構並進行其由放逐到反放逐的自我困境超越意圖。於是源自屈〈騷〉的「憂」、「遊」範式，<sup>66</sup>並出之以漢賦夢幻鋪陳、寓諷於頌、諧謔解嘲等等辭賦書寫藝術，遂融會而為蘇軾放逐時期一連串飲食賦困境觀照的文類策略及其重要底蘊。

#### 肆、蘇軾飲食賦困境觀照之嬗變及其辭賦書寫史意蘊

從放逐到反放逐的困境超越之路對於素以曠達著稱的蘇軾，似乎是理所當然。但從其飲食賦的實際內容而言，其間固有起伏歷程如其宦海風波者。其中大體可以蘇軾謫貶嶺海為界，作為前、後期困境觀照嬗變之考察。

前期之作如〈後杞菊賦〉、〈酒隱賦〉、〈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等。後期則有〈酒子賦〉、〈老饕賦〉、〈菜羹賦〉、〈濁醪有妙理賦〉等篇。前期飲食賦大體以夢幻神遊為主，然則終究難以完全逃脫屈騷困境的終極制約，形成亦遊亦憂的困境底蘊，〈中山松醪賦〉即為其中典型。此賦以「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開宗明義，賦篇內容先藉松樹「嗟構厦其已遠，尙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指涉蘇軾仕宦困境之觀照及其轉折。接著則以「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蹇裳以遊遨。」之幻遊書寫，他選擇以「幽姿之獨高」超越困境的人生策略。而〈中山松醪賦〉篇末歸旨於「漱松風於齒牙，猶是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sup>67</sup>則具體說明蘇軾以遊移於〈離騷〉與〈遠遊〉之間，映現其亦憂亦遊的困境觀照及其旨趣取向。〈書松醪賦后〉之自述即為最直接的具體註腳：

66 參見李豐楙《憂與遊》（台北：學生書局，1996）。

67 此段以上三處引文，參見宋·蘇軾〈中山松醪賦〉（同註14），卷8，頁510。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為世外之遊。……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為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sup>68</sup>

據本文，此賦大體可以代表蘇軾謫往嶺海前的得意賦篇。其中所謂「致思於卒章」即明白指陳「賦〈遠遊〉而續〈離騷〉」的創作底蘊。而此前〈後杞菊賦〉之自嘲自解；〈酒隱賦〉之「眇萬事於一瞬，孰能兼忘而獨遊。」<sup>69</sup>之省思惕勵；〈洞庭春色賦〉充滿〈離騷〉、〈九歌〉情采的飲食幻遊，乃至於借古人愁顏以澆胸中塊壘的書寫取向。大體皆可歸旨於這一建構於〈離騷〉與〈遠遊〉之間亦憂亦遊的困境本質。因此，綜觀蘇軾前於嶺海時期的這類飲食賦，實際乃繼承並運用辭賦之祖屈〈騷〉及〈遠遊〉的原始書寫圖騰，作為前期飲食賦困境觀照與書寫文類策略，應是不言而喻。

有別於謫遷嶺海前飲食賦遊移於屈〈騷〉及〈遠遊〉二者的文類書寫策略，〈老饕賦〉等篇撰於惠州、儋州時期的飲食賦，則大體呈現交集之外的異趣書寫取向。屈〈騷〉色彩已然漸次褪淡。相對而言，〈遠遊〉乃至〈漁父〉的辭賦身影及其意蘊益彰彰顯。

其中較早撰於惠州時期的〈酒子賦〉以「自我膳腹之瓜罍兮，入我凹中之荷盃。瞰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sup>70</sup>之飲食況味，追尋「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的太初幻遊，深刻映現〈遠遊〉中服食養生及其形釋神遊的仙境風情。其次，所謂酒子，據蘇軾賦序所說乃「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並以「醅之漓，以斬予一醉。」於此一未濾之酒，蘇軾則甘之如飴，並且大肆闋衍，津津樂道。並繼之以既醉而醒之歌。其中又隱然映現〈漁父〉裡鋪糟歠醪，醉遊而歌的隱士風標。<sup>71</sup>前述將貶嶺南之際的〈中山松醪賦〉雖已略兆其轉折端倪，然而屈〈騷〉身影仍為其主調。然則，蘇軾〈酒子賦〉裡漸形淡出的屈〈騷〉身影，大體已呈現出〈遠遊〉與〈漁父〉為情志取向的書寫嬗變。

68 宋·蘇軾〈書松醪賦後〉，（同註14），卷8，頁510。

69 宋·蘇軾〈酒隱賦〉，（同註15），卷1，頁50。

70 此段引文參見宋·蘇軾〈酒子賦〉，（同註15），卷1，頁50。

71 參見〈漁父〉，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長安出版社），頁179。

屈〈騷〉身影之漸次抽離，如於儋州所撰的〈菜羹賦〉亦已有跡可尋。此篇雖首揭「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隱喻其屢遭放逐困境，但藉由飲食書寫的困境觀照，及其所悟的遠遊擬想，蘇軾前期飲食賦中始終難以釋懷的屈〈騷〉放逐情結已然消解轉換。其中作者曠達安頓之姿可見於篇末旨歸所述：

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為累，以不殺而成仁。竊比予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sup>72</sup>

從始以「嗟余生之褊迫」至「先生心平而氣和」其中指涉即為對於過往屈〈騷〉不遇之情的焦慮消解，因此晚年心寬體胖，全然不見愁怨鬱結的屈〈騷〉情懷。然則屈〈騷〉情懷指涉君國，為聖君子民，此賦篇末則在「竊比予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的身分歸屬上，轉為遠古「葛天氏之遺民」。其中由身份歸屬的自我確認，其實即間接映射蘇軾飲食賦原有屈〈騷〉身影已然漸次告退，然則〈遠遊〉書寫主調則代變方滋。且在此一嶄新精神國度之下，儼然形塑另一座飲食樂園及其指涉的世外桃源，於此化外之民自得自適美麗新世界中，深刻揭示蘇軾飲食賦由放逐到反放逐的困境觀照及其心路歷程。然則蘇軾嶺海時期明顯流露〈遠遊〉「悲時路之迫隘兮，願輕舉而遠遊。」「參六氣而飲沆瀣兮，溯正陽而含朝霞」以追求無見無聞「與泰初而為鄰」的精神旨歸與書寫身影。與其〈遠遊庵銘〉所謂「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乎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頗為深契。<sup>73</sup>此外，上引〈漁父〉中鋪糟醢醢，醉遊而歌的漁父形象。乃至以飲酒為樂，寄義皇上人之想的陶潛，乃一一深入蘇軾嶺海時期飲食賦的書寫世界，展開古今辭賦中隱喻的心靈對話。因此屈騷〈遠遊〉之外的創作，尤其〈和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書歸去來兮辭贈卓契順〉等尤能映現蘇軾此一時期，從屈騷告退到漁父方滋，從而在〈遠遊〉與陶潛〈桃花源記〉的心靈轉折裡漸次朗現之曠達自適。然而從放逐黃州前後到嶺海謫遷的飲食書寫，大體展現楚騷文學對於東坡辭賦世界的深刻啟發，其中屈〈騷〉、〈遠遊〉對於他晚年發出「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自具重要意義。

72 宋·蘇軾〈菜羹賦〉，〈同註40〉，頁95。

73 參見《楚辭·遠遊》（同註65），頁163—175。又參見宋·蘇軾〈遠遊庵銘〉（同註14），卷20，頁235。銘文謂：「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



<sup>74</sup>然則若進一步藉由上述辭賦典範如〈離騷〉、〈遠遊〉、〈漁父〉等攸關屈〈騷〉情志的飲食指涉，應更可洞燭蘇軾飲食賦的書寫筆調。而其以回歸田園並面對生命，從而勇敢抉擇自由的飲酒前賢陶淵明為式。<sup>75</sup>並以唱和型態展開其與〈歸去來辭〉、〈桃花源記〉之歷史心靈對話。亦應是蘇軾嶺海時期飲食賦向辭賦經典借力的另一重要書寫策略。因此就南方謫遷為具體取向的蘇軾而言，以屈〈騷〉、〈遠遊〉為代表的辭賦經典，原就具備濃厚的南方地理意涵；至於惠、儋二州的嶺海地區，自是蘇軾生涯藍圖未曾意想的生命遠途。然則結合二者分別的映現的歷史與地理意蘊，其實即構成蘇軾生命困境的二大重要質素。至於〈遠遊〉對於蘇軾困境觀照的具體揭示，首在精神世界捨憂取遊的可能出口。然則這一瀟灑夢幻神遊氛圍的生命啓示，必有待落實，於是〈漁夫〉、〈歸去來辭〉裡安貧自適的飲食人生，乃水到渠成地成為蘇軾嶺海時期另一重要的生命啓示錄。於是藉由〈遠遊〉、〈漁父〉、〈歸去來辭〉等辭賦經典的文類召喚，從而呈現別於嶺海之前飲食賦遊移於屈騷與〈遠遊〉取向的情志異趨。於是在逐漸褪去屈騷憂愁基調之外；一如發現邂逅世外桃源者般體味所謂奇絕之遊。並且在憂、遊彼此轉換中，展現為蘇軾飲食賦由放逐之欲掩彌彰到反放逐之曠達自適的重要嬗變及其精神底蘊。於是像〈濁醪有妙理賦〉「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之飲酒觀照下，「獨醉者，汨羅之道也。」的屈〈騷〉背離，昭然若揭。至於篇末旨歸：

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予口。<sup>76</sup>

則以海外耕讀及其清濁歌飲之桃源虛擬自我安頓，其中〈歸去來辭〉與〈漁夫〉之身影，呼之欲出。這一具足自適的世界正如同陶潛筆下的〈桃花源記〉是不容外力介入並加以破壞。然則獨立自足的桃源世界亦成為蘇軾藉由飲食樂園書寫，抗衡與消解放逐困境的重要隱喻。若從文類轉換的另一情志載體而言，其中即一一體現為嶺海詩〈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裡所謂：

74 參見楊勝寬〈筆勢仿佛離騷經—東坡賦考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二期。頁73—75。

75 參見方瑜〈抉擇、自由、創造—試論蘇東坡筆下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2000年。頁259—284。

76 宋·蘇軾〈濁醪有妙理賦〉（同註14），頁511。



我生涉世本為口，一官久已輕尊鱸。人問何者非幻夢，南來萬里真良圖。<sup>77</sup>

於是嶺海終成為蘇軾「不辭長作嶺海人」等詩句所指涉。蘇軾身分認同與鄉愁新變。<sup>78</sup>然則此一隨遇而安的困境觀照固未必等同於陶潛《桃花源記》之避世本質<sup>79</sup>，卻適成為蘇軾飲食賦反放逐意蘊的重要書寫隱喻。故既異前期賦裡屈騷之放逐陰影，亦復有別於陶淵明遺世獨立之旨趣。此中異趨關鍵乃在蘇軾並未能渾然忘卻源自朝中權貴之廟堂驚夢。此種潛意識即具現於他在儋州〈食蠔〉所謂「每戒過子慎勿說，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sup>80</sup>以海南風土食物，反諷北方權貴之汲汲傾軋。從而映現蘇軾以飲食書寫之隱喻其恬然自適的困境安頓，然則嶺海遠遊，無入而不適的飲食隱喻所映射的反放逐意蘊，卻也不免同時洩露蘇軾長期謫居所指涉的放逐焦慮，其實始終並未自其心靈深處廓然一空，但卻也成就東坡曠達任真的傲岸風骨。此即其飲食賦藉由〈屈騷〉、〈遠遊〉、〈漁父〉、〈歸去來辭〉等辭賦圖騰，進行其困境觀照書寫，卻又能獨立機杼，形塑蘇軾自我風格的重要精神底蘊。

## 伍、結論：雕蟲小技下的壯夫困境隱喻及其與辭賦傳統之對話

蘇軾晚年自述平生功業，主要在「黃州、惠州、儋州」。這三個時期集中體現他的生命困境。然則，上述時期蘇軾較之過往密集地撰寫多篇飲食賦，從而成為他放逐困境下的重要書寫特色，並且藉由這些飲食困境本身之豐富論述，觀照身體困境之下的生命困惑及其安頓之道。這對於善於以飲食生活隱喻生命之道的蘇軾，<sup>81</sup>固然駕輕就熟。然則從飲食賦所展現的文類書寫策略而言，源自屈〈騷〉、〈遠遊〉、〈漁父〉等辭賦重要圖騰中的飲食書寫，原就蘊涵精神困境之主要指涉，後代賦家醉酒、飲食等相關賦篇立身處世或家國社稷等主要觀照，實際上與未跳脫屈〈騷〉等篇飲食指涉下，遊移在自我與大我間的

77 宋·蘇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蘇軾詩集》（同前註），卷39，頁2121。

78 前句參見 宋·蘇軾〈食荔枝二首〉。（同前註），卷40，頁2192；此外蘇軾與有「海南萬里真吾鄉」、「我本儋耳民」等類似詩句。

79 參見 朱靖華〈論蘇軾晚年詩詞中的野性〉，《蘇軾新評》（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頁136。

80 宋·蘇軾〈食蠔〉《蘇東坡全集》（同註15），卷93，頁5284。

81 按蘇軾之論述飲食，並不限於一般論述所揭養生之道的關注面向，如蘇軾〈問養生一首〉（同註14），前集卷23，頁263。實則蘇軾與好以飲食觀照人生哲理，例如前文所述〈靈壁張世圖亭記〉即為其例。

困境本質。其次，從蘇軾飲食賦善於營造夢幻情境，並出之以正言若反、戲謔解嘲，乃至曲終奏雅等等書寫範式，亦可一一遠溯楚〈騷〉、漢賦的傳統手法及其特色。對於屈原與漢代賦家而言，這些書寫特徵的形成，本質上即根基於創作困境下的策略運用。然則，這一文類書寫策略，除了可以再現辭賦書寫的傳統困境意蘊外，對於飽受烏台詩案文字之累的蘇軾而言，這一出之以飲食戲謔的雕蟲小技，不僅應與他謫貶黃州詞多詩少的文類抉擇及其書寫策略相契外，<sup>82</sup>嶺海時期更為困蹇的南謫際遇自然不能不益趨謹慎，因此藉由看似無關痛癢的飲食之道，寄寓壯夫憂士之思，大體應即是蘇軾必須面對的書寫課題及文類策略。然則蘇軾在辭賦觀上對於前賢揚雄不無微辭，或則亦與蘇軾認為諸如飲食賦等雕蟲小技寄寓壯夫之思的見解有關。然則蘇軾賦從放逐困境出發，到後期漸趨明朗的反放逐之思，固然深刻映現蘇軾之生命困境及其焦慮，以及探索消解與安頓的精神歷程，從而在〈遠遊〉與陶潛〈歸去來辭〉交融的飲食樂園下映現並重構其心靈桃花源。其次，在〈遠遊〉的傳統框架裡，蘇軾飲食賦以落實人間煙火的變創之姿，跌宕出生命困境觀照下的自適與安頓，並延展而為源自屈〈騷〉、〈遠遊〉辭賦圖騰之另類遠遊型態及其新變桃源隱喻。同時以馬、揚等為代表之漢賦藉由夢幻鋪陳、諧謔解嘲、正言若反及其辭夸典富的賦語言藝術皆一一運用於蘇軾賦裡，並且共同映現為一種困境隱喻及其觀照符碼。這些不僅成蘇軾飲食賦的創作特色，同時一一映現蘇軾融合飲食、困境、辭賦三者的困境觀照及其文類書寫策略。亦為蘇軾其他飲食文類創作無可取代的重要精義所在，然則卻又是與他類飲食詩歌、雜文等作品相互發明蘇軾人生困境觀照的重要書寫依據。<sup>83</sup>其中既代言了雕蟲小技下的壯夫困境隱喻，另一方面則隨著飲食賦之系列書寫，蘇軾亦展開對先秦兩漢辭賦家書寫困境及其傳統圖騰之巡禮與對話。

82 參見王兆鵬《蘇軾居黃州期間詞多詩少探因》，《全國第八次蘇軾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頁225-262。

83 參見王水照《蘇軾散文藝術美的三個特徵》，《蘇軾論稿》（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頁282-284。